

文化政治学读本

[英] 约翰·阿米蒂奇

[英] 瑞安·毕晓普 编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游建荣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化政治学读本

【美】詹姆斯·斯科特著

【美】詹姆斯·斯科特 著

【美】詹姆斯·斯科特 著

（译者：王）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化政治学读本

[英] 约翰·阿米蒂奇

[英] 瑞安·毕晓普 编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游建荣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政治学读本 / (英)约翰·阿米蒂奇, (英)瑞安·毕晓普,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 游建荣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398-0

I. ①文… II. ①约… ②瑞… ③道… ④游…
III. ①文化学—政治学—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2728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文化政治学读本

〔英〕约翰·阿米蒂奇

〔英〕瑞安·毕晓普 编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游建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398-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66.00 元

目 录

导言

约翰·阿米蒂奇 瑞安·毕晓普 道格拉斯·凯尔纳 1

1. 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吗？它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改变吗？

西蒙·杜林 13

2. 20 世纪发生了什么？走向对极端主义理性的批判

彼得·斯洛特戴克 34

3. 远程统治之于民主

贝尔纳·斯蒂格勒 69

4. 通信资本主义：流通与对政治的预先阻止

乔迪·迪恩 82

5. 对抗的政治与互联网：一种批判 / 重建的方式

理查德·卡恩、道格拉斯·凯尔纳 112

6. “目标是人民”：现代化过程中对乡村的再现与美国国家安全论

尼克·库莱瑟 145

7. 当代干涉机制中作为证人的人类学家

乔治·E. 马库斯 173

8. 冤魂出没的 *NOMOS*（法律）：过渡时期阿根廷的行动主义艺术家和（不）可能的记忆政治

维吉·贝尔、马里奥·迪·帕奥兰托里奥 197

9. 改变巴勒斯坦、以色列生态：关于水、土地、冲突和政治经济的叙事，那时和现在，以及来生

迈克尔·M. J. 费舍尔 235

10. 抵抗的弹道轨迹：《消失点》与路的尽头

约翰·贝克 279

11. 残骸、重建与传承：维万·桑德拉姆船系列作品的历史

塔尼亚·罗伊 301

本书编者和作者简介 334

索引 342

导 言

约翰·阿米蒂奇 瑞安·毕晓普 道格拉斯·凯尔纳

《文化政治学读本》专门面向学者、学生和任何对当代文化政治学感兴趣的读者。本书荟萃了学术期刊《文化政治学》中关于这一主题的若干关键性文章，从文化、研究和学科等方面探讨文化政治学。

这些文章选自时间跨度较大的数期《文化政治学》，均由知名作者撰写，向读者介绍了一系列历史上和现时期的批评议题。

可以说，《文化政治学读本》带来的不仅有对理性、技术和民主全新的理解，还有对通信、资本主义和政治新颖的阐释；其中的文章涉及互联网的文化政治、再现、现代化、国家安全、人类学、行动主义、艺术、记忆、公共领域、抵抗和电影。所有这些文章都是专为中国读者挑选的。

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文化政治学的读者来说，《文化政治学读本》的导言部分是一篇理想的预备级文本，它从四个方面聚焦文化政治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文化政治学、作为一本学术期刊的文化政治学、作为一套丛书的文化政治学以及这三个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和学生所做研究的相关性。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既非文化哲学亦非政治理论，其概念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人们常常认为，对文化的研究以及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由于研究所必须涉及的价值、意识形态和权力等问题而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文化政治学成熟于全球化全面展开的时期，发展出随之而来受到赞誉的诸多维度，同时也背负了许多重担，招致了不少非议。如何描述文化作品及文本的政治本性和政治影响，如今已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还催生了文化政治学的其他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将文化政治学理论化？尤其是，如何在讲英语的世界及更大的范围对文化理论及分析的政治目标进行理论化？文化的当代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现在呈现出何种面貌？那一地带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如何对作为政治问题的文化和作为文化领域的政治进行理论化？

要着手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文化政治学如何补充了文化研究，如何不同于后者，又如何在与后者的联系中定位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文化研究在规划和机构化方面的不满，这在母语为英语的全球性大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化政治学这一领域才风生水起。在文化研究内部，其研究和工作有一个受到高度赞誉的政治维度。起初这种政治是某些人攻击的目标，那些人想要对文化研究在其最早表现形式中产生的许多见解视而不见（他们自诩“我们有学识，他们有政治”）。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凭借自身日益被接纳为大学的一门学科，其政治议程也日益变得促狭，这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个人、主体和身份的提升上。如今，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围绕着有关主体的诸多观念，这个主体由经济、历史、统治形式、技术、话语体

系和语言构成。但是把主体压缩成个体主体的做法在许多学者看来过于局限、自说自话（solipsistic），而且最终趋于保守。对文化研究而言，不那么精确地说，个人的不仅是政治的，而且只有个人的才可能是政治的。由于许多原因，而且不乏反讽地说，对政治的这种规划反映出大学教学人员扮演的角色：目光短浅、审时度势、生搬硬套、画地为牢、胆小懦弱。

因此，文化政治学的出现就是为了更正文化研究议程的某些要素。现阶段有关文化政治学的各种学术写作形式——从有关大陆哲学的工作到政治理论、技术文化、历史、安全研究、媒介理论、人类学、美学、艺术实践、社会学、军事批评研究、电影研究和文学研究——使文化政治学成为这样一个领域，一方面在禀受的文化和理论影响方面有所不同，其中包括让·鲍德里亚、马丁·海德格尔和弗雷德里希·基特勒，仅提出三个迥异的大家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文化政治学领域及其背后的学术灵感在各自的目标和效果方面又有诸多相同之处，主要是二者都通过大量文化形式和规划，对包括抵抗、批判和重建在内的种种应对政治的方法进行理论化。

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投入近来已不时趋于温和，不过也许是因为政治本身已变得温和乃至文化研究也无计可施。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局限的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研究相当机械地复制了最初让它得以在大学开辟出一席之地的那种研究。在有关性别、种族、性征、族性、离散、移民状况和其他个体身份问题的前沿研究中，大量原本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工作开始失去力量，尽管它们所处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没有发生变化。在富裕的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妇女、少数族裔、男女同性恋和其他团体还是照例得不到平等对待，处境之差令人发指，尽管文化研究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出版发行已历经数十年之久，而且有着明确的旨在纠正这些不平等的“政治”议程。

但是，文化研究做出的智性介入之所以有时得不到热烈回应，究其原因大抵是文化研究在耕耘个体和主体的这片疆域时，个体和主体的状况业已遭受了种种更大、更难对付的力量和权力的严重侵蚀。提出这一论点的是一些著名的文化研究思想家，譬如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由此，他们开始为文化政治学竖桩划域。他们的论点引人注目，深深触动着那些依然忠于人文主义传统和人的概念的人，这一人的概念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张扬的，也是其智性追求的主题。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也许更深层、更具生产潜力的议题，这些议题还不被当前学术机构内部或外部的惯例认为直接或明显与政治相关，而且也不必然会被简化还原成作为学术质询中心的人类或主体问题。说到对这些议题进行过分析的理论家，仅举几个例子，其中就包括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杰夫·本宁顿（Geoff Benningto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还有许多投稿者发表了高见，每个人都立场鲜明地用批评和怀疑的眼光审视知识遗产，揭示出文化政治学广袤领域的若干轮廓。

这些研究者所指向的在某一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政治投入，能够复兴有时被文化研究省略掉的政治议程，由此使自己的探询转向了文化政治学。有些学者通过一以贯之地回归从黑格尔发展至今的大陆哲学传统中蕴藏的理论根源来追求这一议程。但是他们尤其要面向当代的议题，认为这才是文化政治学的题中之义，而且他们谨防现在主义的近视（presentist myopia），立足历史性（historicity）和形而上学的坚实土壤，力求解释使政治学和政治成为可能的当代状况（2002：24-57 and 1992：1-34）。与之相反，诸多研究路数不同的政治学现在则在文化研究中进行大量的引证。比如，“多数人”

或“移居者”的政治学就是又一个让政治窒息而死的例子。这种研究预先决定好政治的构成之物，完全忽略了在做决定的能力内发挥作用的東西：即对一个适当的决定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忽略了决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实用主义、行动、机构制度建设和法律——的出现所倚靠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也就无望对他所希望实现的那种变化产生任何影响（2002：24-57 and 1992：1-34）。

于是，这些学者回归了由理论提出的有用而棘手的议题，他们提醒我们，文化研究内部对政治的普遍表述可能是，并且通常就是半自动化地表述对种种事件做出的标准的“自由主义的”反应，这些反应不会深入到各种决定得以做出和可能得以做出的条件下面去一探究竟。实际上，这些文化政治学学者审视文化研究的政治话语，就是为了揭示，如果不对作为概念的政治加以问题化和批判，他们的话语及分析的目的意图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德里达所谓“解构”的本质，它昭示着种种超越，超越那些常常让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受到牵制的“安全”乃至自动化的政治分析；它还提供了种种思考政治的方式，超越世界社会论坛/街道行动主义这类途径的同时，也丰富着那一途径。

一系列深入却又并不总是加以明确表述的立场和关系造成了胆怯，对现阶段很多批评质询产生着负面的影响。这些立场和关系既是部分构成文化政治学领域的东西，也是该领域所要研究的东西。我们有诸多在日益专业化和公司化的机构（全球研发型大学）中运作的学科，这种机构本身是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异常狭隘的西方军事化民族国家内部发挥作用的，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对大学心存疑虑的同时为了自身的存在和永存又要倚靠大学。因此，当我们思考批判性学术工作何以沦落至此，该如何摆脱当前处境时，又如果那些其工作在这一处境内运作并助长了这一处境的人也希望摆脱这一处境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牢记这些无限复杂和重叠的关系。

然而，“安全的”智性选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各种力量共同造成的结果，这些力量超出了我们个体的转变自己的机构化位置的能力，日益将我们置于纯粹为了专业的和个体的生存而展开的霍布斯式混战（Hobbesian free-for-all）中——尽管这一生存的舒适度的确达到了高级资产阶级的水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教授们几乎自动表现出怯懦，关注的是下一轮评估、终身教职的评定时限、晋升阶梯、自然累计的退休基金和津贴。像大学运转于其中、文化政治学介入其中的许多系统一样，这些机构制度的轨道让我们不停点地猛烈工作，以便在规定的框架内达到业绩指标，从而迈出下一步。每个个别的时刻都在向未来某个时候需要达到的某个更大、更迟的目标无限推迟，不论这个目标是终身教职，还是退休抑或死亡。这个目标总是“即将到来”，其未来的维度既使我们衰弱又解放了我们，如果我们能对其伎俩投去敏锐的批判目光的话。这就是文化政治学的承诺，因为它能够使自己与我们在其中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这些深嵌的系统结成联盟，尽管不断推迟的未来目标所造成的阻碍，可能比带来的实惠显得更为明显。通过在工具主义逻辑内部工作并且使用工具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反对工具主义自身，文化政治学未来的力量可以被理解为和调动成一种让工具主义脱轨的手段。如此一来，文化政治学的形态就不会受制于束缚着我们的机构制度的绑带，尽管文化政治学的存在有赖于那些绑带。这是理论教给我们的，只要愿意认真倾听。

《文化政治学》：期刊、丛书、读本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愿承认，某些特定的政治介入，对于人文科学、艺术和定性的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确立和引进，依然是必不可少的。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上午，伊斯兰恐怖组织基地

组织对美国发动了四起同步恐怖袭击，各方对此做出了许多反应，不同种类的极端主义不断复苏，这一切使得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让政治在教学和研究的议事日程中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这一呼吁已不无裨益地纠正了个体层面的身份政治所做的过于狭窄的分析。过去几年来，各种英语学科间期刊开始拓宽视野，发布的特刊涉及政府与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取代全球化的去殖民选项、安全与监视以及知识产权。这些特刊显示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关注：一系列层面和范围中管理的失败、地缘政治经济的复杂性，以及欧洲和北美复活了的安全国家（resurgent security state）带来的许多影响。好像就在最近有一种要求再度成为政治的律令，而且还不能把这种政治局限到个体层面。《文化政治学》（杜克大学出版社）这一期刊十多年前由约翰·阿米蒂奇、瑞安·毕晓普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创办，旨在探讨这些关切，帮助培育正在出现的文化政治学领域。为了让大家对这一领域有所认识，对该期刊希望如何去塑造这一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在此简单罗列一下这些年里刊发的一些特刊和栏目：“靶子而已”、“权力的速度”、“彼得·斯洛特戴克之欣快的现代性”、“核故事：冷战文学”、“贝尔纳·斯蒂格勒：哲学、工艺和行动主义”、“重访鲍德里亚：完整现实的解毒剂”、“利奥塔尔的美学”、“情感风景”、“乌托邦”、“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与战争”、“介导地质学”，以及“奢侈的精神”。关于“奢侈的精神”的特刊探讨了历史与经济、道德与审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艺术与奢侈品牌、当代礼仪、奢侈风尚和不平等。（Armitage and Roberts 2016）

不管发轫于何处，文学或美学理论、媒介研究或美学、历史或人类学、技术研究或监视研究，如今文化政治学主要的理论工作都可见于这份期刊的字里行间，而且在由本导言作者编辑的期刊的孪生丛书《文化政治学书卷》（“a Cultural Politics Book”）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

虽然在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许多领域中都有地缘政治议题的回归，这些议题还是被“人权”的镜头过滤掉了。“人权”的镜头限制了人类能动作用的功效，不论这一能动作用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这一启蒙的特定属性和人文主义事业的核心品质最近已出现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等人的作品中，指向他们所谓的“行星人文主义”（“a planetary humanism”），似乎跟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古老梦想没多大差别，而后者则驱动着这些学者们声称要抵制的那些政府事务（governmental practices）的议事日程。这些作品从学界内部弥补了学界之外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或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的不足，同时介入了围绕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Empire*）和《多数人》（*Multitudes*）的流行及影响展开的对话，这些作品颇具煽动性但根底里则问题重重。虽然人们当然希望继续珍视解放、平等和公正的理想，但人们也知道，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时代（Kellner 2016），这些理想被用来证明下列各项的正当性：反恐战争、不受约束的市场（unfettered markets）、充当伦理学的种种轻松的道德主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以及西方民主国家中种族主义仇外（racist xenophobia）、仇恨犯罪（hate crimes）和移民替罪（immigrant scapegoating）的复归。不幸的是，虽然所有这些冲突行动依据的是相同的貌似无懈可击的普世理想，当前文化研究方面的研究对于驱动这些行动的技术方面的发展却鲜有投入，也不能完全和客观地理解这些理想如何限制了行动和做决定。此外，这种研究几乎从不虑及支撑着行动所理应具体呈现的那些先验理想的诸多形而上学基础。这些将先验理想与行动及其形而上学支撑连接起来的议题为作为一个领域的文化政治学划定了范围，也为期刊、丛书和该《读本》的内容划定了范围。

媒介研究、电影研究、电视研究和新媒介研究等亚领域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可是它们有时还回避以批评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技术创新的历史性和谱系。这一回避由此也忽视了这些技术的军方血统，忽视了它们有能力使全球乃至过去七十年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军事化。特定的理论家，尤其是保罗·威里利欧（Paul Virilio），使这些问题成为其研究的中心，但是世界的军事化在基于人文科学的多数研究内依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未经考虑的故事。有鉴于日常生活的军事化不仅伴随着被稳稳当当供奉起来的科技力量，而且还需要事实上每一层面文化的军事化，这一局面着实令人担忧。如果文化研究，比如说，把文化当作其首要的关注点，且如果这一研究对象与二战后世界的文化同义，那么军事及其显著影响就需要我们持续的注意——这一要点是由像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样截然相反的思想家在 20 世纪中叶提出的。人们日渐意识到，明智的做法就是要远离牢牢把持着文化研究领域的个体和身份政治的中心性。毫无疑问，这一意识如今已大量渗透文化研究。然而，对文化政治学来说，这一智性方面的转变需要一种包含伦理学的政治学，前者不会受到种种简单化的道德主义的阻碍；需要去审视思想的技术性；还需要使思想成为可能的诸多条件——形而上学的、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

《文化政治学读本》努力要做的就是以上勾画出来的那种研究。该书对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体现为，它不仅明确地坚持批判或捍卫公认的或占优势的话语，而且明确地坚持文化研究的“自我批判”（autocritique），坚守文化政治学浮现出的学科间状况应有的边界。当代文化政治学不再满足于智性的、社会经济的和文化的结构方面简单直接的批评观念，它留意的是新近出炉的对某个时代及其历史性的重新评估，是对尚存的界限和理性观点的批判，是纷纷总总的概念：“远程统治”和“通信资本主义”、人类世（anthropocene）、

后数字性、媒介考古学、瞄准、见证、冤魂出没、回飞和弹道。

文化政治学主要的理论工作如今可见于《文化政治学读本》，该书的篇章不时带来对文化和权力具有倾向性却又不乏独特启发性的运思。《文化政治学读本》为研究者和学生呈现出对文化政治学及相关学科中不断变化的鲜活理论思辨所进行的清晰又贴近时代的探索。它还表现出不断增进的对文化研究的理解，正确评价了文化政治学如今对众多理论立场的渗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环境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诸多难以分类的理论影响种种复杂的、策略上的组合，不论它们有多么开放。

以下各个篇章既面向核心主题，也展示出各个作者在当代文化政治学中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同时还提出一些为该领域所接受的传统主题。文化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众多表现形式为我们几位编者挑选构成本书的若干篇章提供了主要的标准。《文化政治学读本》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与之保持了距离，于是，它最后提出的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研究的恳求，而是一个吁求，呼吁对在作为文化政治学的文化研究的旗帜下进行的理论工作展开批判——这也是这篇导言发起的吁求——还要评估这样一种批判对文化政治学学术领域未来的调查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此举表明，微观现象虽然在更大的宏观轨道内运作，源自更大的宏观轨道，却能同时改变这些轨道。

文化政治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相关性、影响和吸纳

在全球范围内与文化政治学相关的学科和领域开展的研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影响日益增强，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适时出版能有助于批评研究的议事日程在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

够将更多的中国声音和学识纳入全球学术话语。虽然文化政治学以可辨的形式存在已有三十余年,《文化政治学》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我们依然认为这个领域和这本期刊现在正逢其时。全球的状况、破裂、分歧、希望和抱负正在与机构式大学、人文科学及定性社会科学中的批评理论相互激荡,这就要求我们持续认真地批判构成各个层面文化中的政治和政治中的文化的东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和生发这些辩论、分析和议题。

批评研究传统上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一代代年轻学者在稳步建设中国学术的基础,希望在增进和扬弃传统研究的过程中使其更多地介入全球学术话语。这些学者当中有许多人已在海外受到学术训练,主要是在北美和欧洲的学术机构,这为他们带来了一套真正超越文化、超越知识和超越认识论的策略,这些策略非常契合文化政治学的出现。在复杂的跨认识论传统的智性地带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追求自己的批评研究的同时,可以考虑一下,对科技之物质性的研究势必离不开对经由网络连接的全球资本主义和行星范围内环境变化的研究——这些议题划定了当前的状况,勾画出文化政治学内重要的轨道。这一独特的境况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界人士在科技、物质、信息、机构制度和非物质质的框架内进行非同寻常的定位,有关文化与政治的知识以及经由二者获得的知识在这些框架内进行生产、流通、合法化和批判。《文化政治读本》念及的就是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和学生,它的目的就是要在当代文化政治学这一非凡的框架和定位内提升这一独特的境况。

参考文献

Armitage, John and Roberts, Joanne. (eds.) "The Spirit of Luxury", *Cultural*